

的保护提供一个名声很好的事实,也不可能为出现一项真正的新兴工业而运转。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保护就没有必要,并且在那段自由化的时期内,必须面对向出口国的其他群体重

新付出暂时保护的代价问题。或者不发生这种情况,那末,继续保护会引起进一步的投资,而这种投资在经济上是没有生命力的,而且在将来还会出现额外的调整问题。

改革纺织品协定

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并不一定要为多种纤维协定松绑,双边协议就更为灵活和更少限制性。可能发生的较为激进的一步是在纺织品上完全取消多种纤维协定的配额,因为目前是发达国家的厂商,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厂商才是出口的支配者。

在多种纤维协定取消以后,任何纺织品体系的形式取决于乌拉圭回合中对关税、保障措施和其他问题的谈判。而在这些问题上的谈判又部分取决于对纺织品贸易前途的预测。

涉及关税谈判中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回到关贸总协定中的一个部分,多种纤维协定项下的配额应否把相当高的关税继承下去。在发达国家中,纺织品和服装的最惠国关税的加权平均水平即使在东京回合的削减以后仍然是高的。在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是 11.5%,在美国是 19%,在加拿大是 21.5%。一般来说,纺织品和服装的最惠国关税目前比制成品整体的关税要高出二至三倍。由于关税升级,有效保护的水平甚至更高。然而,只要能取消配额,采用适当的高关税的设想还是合理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双边协议谈判已明显地逐步放宽限制而取消配额。由于生产技术上的改变,配额已成为多余的了,而且对服装工业来说,配额已成为一笔不必要的代价。出口加工配额的增加是恢复服装厂商和纺织品厂商之间利益平衡的

一个方法。这样可允许发达国家的服装厂商以海外加工方法来进口配额以外的衣服。

取消多种纤维协定的另一个前提就是要有一项改革了的保障条款。该条款应允许在出现市场扰乱的情况下采取配额措施。谈判一项保障条款的可行之处是非歧视性的,这向发达国家提供了一项合适的最后求援措施。

在多种纤维协定上,发达国家提出发展中国家要给予互惠的问题,这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出口纺织品和服装上享受更优惠待遇的报答。另一个与互惠平行的问题是贸易伙伴的差别待遇,这也成为多种纤维协定的一个特色。对来自较先进的纺织品出口者要求互惠的压力,对低收入国家或较小出口者给予更优惠待遇等,将是纺织品和服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并将在乌拉圭回合中广泛讨论。

第四个多种纤维协定在 1991 年到期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议定书来修正多种纤维协定和提出逐步结束多种纤维协定的具体条件。要定出一个终止多种纤维协定的日期,但终止日期不要太远。要体现出过渡时期内递减的专门承诺,这些承诺应保证在双边协议下增长率和灵活规定有长足的扩大。要在协议中体现出有关逐步结束的原则和总的条件,并应事先在谈判中解决。在 1990 年以前,一个拓宽和取消配额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已在运行之中。

结 束 语

乌拉圭回合不可能对结束多种纤维协定或朝着一个更自由化的纺织品体系的谈判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工业国家政治影响上的既得利益和大批发展中国家的默认凑在一起已经可以使这个暂时性的协定长命百岁。但是人们越来

越认识到保护主义和贸易管理沿着多种纤维协定走下去,必将会对工业经济经济效益起腐蚀作用,必将会挫伤在关贸总协定项下自由化贸易的出口潜力。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末,乌拉圭回合可能是结束多种纤维协定的开始。

论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加快

建立外向型经济体制

李邦君

实施我国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涉及经济体制问题。诸如外贸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海关体制、商品检验体制和科技体制等，都要积极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服务，有利于经济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目前这些体制在总体上都不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必须加强配套改革，促进外向型经济体制尽快建立起来。

实施我国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涉及经济体制问题。诸如外贸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海关体制、商品检验体制和科技体制等，都要积极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服务，有利于经济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目前这些体制在总体上都不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必须加强配套改革，促进外向型经济体制尽快建立起来。

一、深化外贸体制改革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为了更好地扩大对外贸易，必须按照有利于促进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方向，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外贸体制。”当前外贸体制改革应迈出的重要一步，仍是推行全面经营责任制，将工农商体制改革行之有效的承包制，全面引进对外经贸行业。

这次外贸体制改革将有力推动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沿海地区应根据外贸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今年改革的任务，积极研究制定外贸体制改革实施的方案。为此，上海市已作出决策，赋予一批企业以直接对外贸易经营权。首批获得外贸经营权的，有上海纺织行业的申达、华申、康达三个企业集团和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上海第七印绸厂、上海第一丝绸印染厂三个企业。此外，上海毛麻纺织行业将进行工贸结合、放开经营的试点。这些获得外贸经营权的企业、集团，连同现有各类外贸公司，都按照责权利统一的原则，实行“双承包”，即财政上缴任务承包，出口创汇任务承包，为

振兴上海经济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作贡献。上海能这样做，沿海各地区也可以这样做。只要沿海地区都积极按照外贸体制改革方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就会扩大对外贸易，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奠定基础。

在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后，还要相应地改革外贸计划体制。要进一步缩小指令性计划，适当减少国家统一经营的出口商品。过去大类商品统一经营有 1200 种，后改为 100 种，现在还要进一步减少为 20 多种。缩小统一经营的商品范围后，国家主要加强宏观指导和平衡，从过去直接控制为主转变间接控制为主，这有利于发挥竞争机制作用，调动沿海各地区、各企业经营外贸的积极性，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

二、深化财政税制改革

外贸企业和赋予有外贸直接经营权的生产企业，目前税负较重。为着增强出口竞争能力，调动扩大出口的积极性，财政部门应适当调整税率，实行差别税率。从总体上看，捐税要有利于鼓励出口，体现对出口的支持。为此，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改革出口退税制度。现行出口退税是在出口行为终止多日后才实行，基本上起不到支

持外贸出口的鼓励作用。从实践上看,出口退税应改为供货免税,把集中于口岸支付的出口退税分散在各地,由非专业系统调拨和非出口销售时照章纳税,这不仅能抑制出口产品的非出口经营,而且能提高外贸出口供货的竞争力。

第二,按出口盈利大小来捐税。对出口盈利较大的商品应适当征收所得税,对出口盈利小的商品可以不予征税。

第三,要降低外贸所得税封顶税率。目前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外贸经营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而且盈亏往往不稳定。这就需提高盈利所得税起征点和降低封顶税率,让外贸企业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对进口商品的捐税也要作进一步改革。自1979年以来,我国对人造丝等加工原材料的进口已实行减免工商税;对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所需要的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的进口也一律免征工商税。为限制一些不必要的进口,除少数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的进口外,其余商品进口均由订货单位自负盈亏。对盈利较大的商品应一律征收工商税。

通过上述税制的深化改革,不仅能引导企业扩大出口贸易,增强出口创汇能力,而且能防止抬价抢购出口货源和削价竞销的现象,也能防止盲目重复进口的发生,从而促进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三、深化银行信贷体制改革

在实施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中,如何进一步发挥银行的杠杆作用,改进信贷方式,已成为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我认为,在以下几方面应作出卓有成效的改革:

第一,要突破银行贷款的某些数量限制 原规定固定资产必须有自有资金30%、流动资金必须有50%才给予贷款,这不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需要改革。只要产品有销路,有偿还能力,就应该允许借贷。同时,要通过调节贷款的数量、方向和规定差别利息率,促进出口贸易协调发展。

第二,要继续发放各种贷款 例如,出口工业品生产专项贷款、短期外汇贷款、出口产品技术措施投资和扶植出口商品生产资金周转等,同时给予低息贷款,支持扩大出口生产和增强出口创汇能力。

第三,要调整信贷结构 在支持出口创汇中,要办好科技开发贷款、技术改造贷款,促进科技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要贷款支持技术引进,促进先进技术的吸收、消化和创新;要支持大中型企业以及工贸、工农贸、工商贸等企业联合体和企业集团扩大出口创汇。对这些方面需要的合理资金要积极支持借贷,把银行资金同企业资金结合起来。

第四,改进信贷方式 充分利用银行各种信贷方式支持发展外贸业务是世界各国目前通行的做法,而我国目前银行信贷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卖方信贷,缺少提供买方信贷。出口买方信贷在国外已基本取代卖方信贷,它在扶植出口成套设备或达成大宗交易方面起了主要作用。我国也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积极开展出口买方信贷业务;同时,要推行“打包放款”、“出口押汇”和远期票据贴现、改进进口开证保证金和结算方式等。通过多种信贷方式,加速资金周转,促进资金融通,提高资金效益。

第五,欢迎外资银行来华设机构 在沿海地区要根据条件欢迎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来华设立常驻机构,建立中外合资银行和中外合资财务公司。近几年已有24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设立192个这些方面的机构,今后应进一步放宽政策,制订管理法规和措施,逐步多建立

一些外资银行机构，扩大业务范围。同时，我国国内银行也要有计划地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吸收国外资金到国内投资。

四、深化海关体制改革

随着我国沿海外向型经济深入发展，海关体制深化改革也日益显得重要。在这方面，我认为要作好这样几个工作：

第一，要发挥关税的调节作用 关税率高高低，关系到进出口业务发展和外贸盈亏。为了调节进出口成本的高低，调节经营单位的收益情况，海关向经营单位收取进出口关税是必要的。但是，应实行差别税率。对出口关税宜征收低税或实行免税，特别是对“三来一补”业务要给予支持；对消费品和国内能生产的产品，进口关税应略高征收；对盈利较大的进口商品还要调高关税。通过这样的调节，既发挥“奖出限入”的作用，又把进口企业责权利统一起来，按发展外向型经济需要搞好经营。

第二，要积极建立保税仓库 保税仓库对经批准而未经纳税进境、并在境内储存、加工、装配复运出口货物提供方便。目前上海海关已审批建立保税仓库 156 个。建立保税仓库使企业免交保证金，增加资金。例如，1986 年上海复印机厂同美国施乐有限公司签订进口组装复印机，因向海关交付保证金 20 多万元，影响资金周转，工厂陷入困境。可见，建立保税仓库对促进企业增加生产和鼓励出口贸易很有必要。

第三，要给予进出境人员提供方便 报关手续要简便易行，客商可办理多次往返有效出入境签证，检查机关优先放行等。

五、深化外商投资服务体制改革

沿海地区华侨多、台胞多、离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热点”很近，可以吸引更多客商来投资。但是，现在客商感到最头痛的是我们办事关卡多、环节多、效率低等“软环境”建设很差。对这种服务体制如不深化改革，就不能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要建立和完善外商投资的管理机构 高度集权、高度分权，是办事效率低的主要原因。从县、乡来讲，权力高度集中于省市一级；从省市来讲，这些权力又高度分散在各个部门；各个部门的权力又分散在具体经办人员手中。而各部门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有些具体经办人员素质又不高，这种体制实际上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障碍。为此，上海市、宁波市、福州市等都致力于改善这种投资环境，将管理“三资”企业的综合部门集中于涉外经济中心大楼办公，实行“一幢楼办公”、“一个口子对外”。既介绍经济合作项目、对象，又提供翻译、导游、秘书和雇员，并负责安排食宿、娱乐、参观、旅游、洽谈、商务等活动，还代办运输、报关、签证、订购机票等一切手续，从而增强了客商来投资的吸引力。

其次，要扩大和保障投资企业的自主权 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常务理事武吉次郎先生反映，日本企业界对中国投资的软环境仍然存在顾虑。除了投资前手续太复杂，使一个合作项目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外，还顾虑“投资后的软环境中最大的问题是企业的自主权还不能得到保障”。这是很引人深思的。这个自主权，我认为应该按照国际惯例来扩大和得到保障。在人事、工资制度上，应实行干部自选，工人自招，工资自定。要量才定职，可招聘，也可辞退；工资随企业效益上下浮动和自行决定奖励方式；在经营管理上，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

方式;在经济活动上,有权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有权确定本企业的产品价格等。也就是说,对“三资”企业的经济计划权、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购销权、资金支配和运用权、劳动工资和人事权,要真正按国际惯例来落实。目前,我国对“三资”企业的自主权问题也作了明确的政策规定,如果真正落实兑现了,客商会在“货比三地”中对我国投资环境感到满意,定会形成到中国投资办厂的高潮。

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

根据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国际收支状况和我国贸易政策,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要深化改革:

第一,克服外汇管理分散状况 近几年我国实行“三管齐下”(国家计委管外汇计划、国家外汇管理局管外汇管理、中国银行管外汇经营)、“三块并存”(经贸部管外贸外汇、财政部管非贸易外汇、中国银行两者兼管)的外汇体制。这对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一定作用,但由于宏观控制手段没有相应地跟上去,出现“多头管汇、多头批汇、多头用汇”的情况,造成“一女多嫁”。为了集中统一,中国人民银行应发挥职能,抓宏观,控制外汇总量,搞好外汇综合平衡,制定外汇法规条例,对于外汇具体业务应放手让中国银行去经营。中国银行不单是经营实体,也要代表国家监督外汇活动,推动出口创汇,提高用汇质量,促进吸收外资和引进技术工作的开展。今后还可以考虑把外汇管理局再归并到中国银行,把管理与经营统一起来,避免机构重叠和外汇管理多头分散,便于从总体上和主导方面加强外汇管理。

第二,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建立外汇调剂市场 外汇留成是鼓励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目前额度留成制度往往不落实,被层层截留,造成外汇使用分散。为此,要管好外汇额度留成,银行要从严掌握现汇帐户,建立外汇额度帐户,使额度留成真正落实兑现,起到鼓励出口创汇的积极作用。同时,进一步开放外汇调剂市场,对具备条件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要积极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的相互调剂业务,代客户办理即期和远期外汇买卖业务,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调整和改革汇率制度 汇率直接关系我国外贸盈亏和我国外汇储存多少。近几年我国人民币币值实际上已发生了变化,如果进出口价格仍然按照固定汇率确定,必然影响出口的外汇收入。国外目前较普遍采用浮动汇率,我国是否采用,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探索。但是,汇率不能长期固定不变,必须随国内外币值变化而作相应地调整,以反映国内外价格变动情况和外贸企业经营状况,使汇率更好地发挥鼓励出口的杠杆作用。同时,银行要帮助企业防范进出口贸易中可能产生的汇率风险,以利于企业更好地开展大进大出。

第四,制定和执行外汇管理法规,加强外汇管理 对已制定的法规要认真执行好。首先,要抓创汇。外汇管理部门要努力促进外贸出口,增加国家外汇收入,各有关单位要紧密配合,积极催收逾期未收回的外汇;对未经管理机关批准,擅自存放境外的外汇要限期收回;其次,要控制用汇。除必须进口的原材料外,不能用外汇进口高档消费资料,应当把有限外汇用在增加出口创汇的项目上,把外汇用在刀口上。此外,要严禁非法倒卖外汇活动,外币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内流通,取缔炒买炒卖外币,外汇券黑市等,使外汇管理在新形势下得到进一步加强。

七、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

发展外向型经济迫切需要科学技术和各种专门人才。目前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还不适应发展

(下转第 11 页)

西方管理理论及其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借鉴意义

沈 根 荣

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自19世纪末产生以来,已经历了将近1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西方的许多管理学家在总结当时企业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收诸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哲学、运筹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工程学、计算机程序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各种反映企业管理需要的理论,推动了西方企业管理的发展。这些理论概述其要,有:

一、管理组织理论

西方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组织可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指企业为有效地实现企业的目标所规定的企业各成员之间相互关系和职责范围的一定组织体系。非正式组织则指企业对共同工作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以共同感情为基础的非正式团体。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相互依存,并对企业效率的提高起重要作用。对于企业管理组织的结构,有些西方管理学家认为,主要可归纳为5种类型,即:(1)集权的职能性结构;(2)以事业部制为代表的分权结构;(3)以加强职能部门之间以及职能部门与规划项目之间的协作为目标的矩阵结构;(4)以盈亏中心制形式为特征的模拟性分散管理机构;(5)由范围很广且相互独立的单位参加,为完成共同目标而组成的系统结构。西方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织结构取何种类型,应根据企业性质、条件和管理者的特点来确定。

二、管理职能理论

管理职能理论是古典管理学派的重要贡献。最有代表性的系统化管理职能理论当推古

利克的POSDCORB,即管理7种职能论。古利克提出的7种管理职能是:(1)计划,即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制定的工作纲要及实现办法;(2)组织,即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建立的组织结构体系及各层次的职责范围与协作关系;(3)人事,包括雇员的选择、训练、培养和恰当安排等;(4)指挥,包括对下属的领导、监督和激励;(5)协调,即企业各部门间的工作和谐,步调协同,共同实现企业的目标;(6)报告,包括下级对上级的报告和上级对下级的考绩、调查和审核;(7)预算,包括财务计划、会计、控制等。

三、需要、动机和激励理论

需要、动机和激励理论是行为科学家对企业管理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们指出,人们的各种行为都有其动机,而动机又产生于人类本身内在的、强烈要求得到满足的需要。在企业管理中,应根据人的需要和动机加以激励,使之更好地完成任务。在需要、动机、激励理论方面,行为科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人类基本需要层次论,把人的需要从低级到高级分为5个层次,认为人的较低层次的需要满足后,就会进而追求满足更高一级的需要,而已满足的需要不再起促进作用,因而企业必须不断给雇员创造各种环境,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需要,才能有效地激励雇员。赫尔伯格提出了双因素理论。他认为影响人的工作态度的因素可分为:(1)成就、表彰等产生使雇员满意的积极效果的激励因素;(2)薪金、同事关系等不能直接起激励雇员的作用,但能消除雇员不满情绪的保健因素,并提出在消除雇员不满情绪的同时,应采用“工作丰富化”等管理方法,增加激励因素,以提高